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五 十 四)

【往事追忆】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火车上的记忆

• 朱学勤 •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偶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点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恶业，七个字，除最后一个，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国家”与“社会”，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个“注”，中国学者在后面跌跌爬爬，捡拾不已，也还是按耐不住。有一次在家给研究生上课，聊起国家税收和黑社会勒索保护费有何差异，竟然发生思维短路，脱口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两个外省来的好孩子大吃一惊，赶紧低头，往本子上捣蒜般地猛记；我自己也吓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车上的童年创伤用“学理语言”说破了。

—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我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事后想来也还是愕然。到了老北站，只见人声鼎沸，势如潮涌，一波一波涌进站台，也不见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学生们冲上站台，指点着十几条卧轨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那股指点江山的豪气，肯定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在外滩大楼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几乎无法立足，只好怏怏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撬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样，

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象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做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云南”，后天蒙“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我后来听说，1979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了国际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象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犹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象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象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肉饼子不可！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我们就象铁道游击队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走，她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她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棚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她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离开南方两年，这是第一次看到青山绿水，我们兴奋地向那些牧童大叫，那些牛背上的孩子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两个河南盲流押到车站派出所里，一个劲地盘问，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不料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那当然是对答如流，问不出破绽。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但是结尾留有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就这样流产了。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信然！

我后来阅世稍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干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惊呼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呼声也最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呼喊。被我的一个历史学同行，复旦教历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听到了，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一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信然。

我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我所生活过的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他们几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个低洼的盆地，周围高地山民，不管隶属哪一部落，都能对他们投以白眼。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穷困中产生愚昧，以及与愚昧相伴相生的浑厚。

我们离开兰考到三百里外的巩县当工人，村里的五保户大娘实在想念，居然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火车，有一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居然在车头手舞足蹈地大嚷：“噫！这玩意停下来象长虫，不吃不喝，咋会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车被迫停下，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陇海线停车事故。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革命先锋”，人民日报发他的长篇通讯，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和我们集体户户长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到了人民大会堂，闹出一次比小说里陈焕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河南人的习惯，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到了人民大会堂也是那样，老支书双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个神圣的位置。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他还未蹲结实，底板就翻了过来，把我们的“革命先锋”在人民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应该看到这一喜剧小品了，多半会很慈祥地莞尔一笑？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

，又是小脚，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不迷路，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厂，真是一个奇迹。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不得而知，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给她擀面条，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恐的叫喊：“噫！这屋里咋还有一个老娘咧？咋也是黑裤子、红袄？！”（也是要中原土音念）。兰考民俗，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猛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呼小叫，惊动了一座楼！

还有年青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淳朴，富于同情。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卡车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车一开，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齐声痛哭，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兰考民间的规矩是，男人不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门的闺女骂。那个司机被这群小闺女骂得不敢还嘴，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

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功课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个老乡叫“假妞”者，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相反。“假妞”们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这是天边露出一丝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上海集体户，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后，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照顾这个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三两年一过，待我们十个人走完，他们的年龄也被耽误了。平日里我们玩得很好，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上调，他们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得远远的，从不参加送行的行列。那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没人能忍心对视。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象在这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先是老毛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挤了倒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倒下去的那段无声岁月；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来了。老毛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以我之拙笨，始终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老毛，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怀疑，天是看不见历史运动中的暗层夹缝的，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魂。1997年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不经意间，已经换了一代人，确实未见天老一分，只是原来担心的那种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尴尬，并没有出现，可以松一口气。我们就象三个陌生的路人，只是

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猛回头，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声：“噫，这不是学勤吗！”——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还是回头再说混客车的故事吧，按老乡说法，不叫客车，叫票车。

我插队的那个庄子，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衫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性质的外事活动。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集体户按县委宣传部安排，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柬埔寨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想，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后来我读到波尔布特暴死，以及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的屠城暴行，有点不安，却只能就与我爱人小声嘀咕：弄不好我们当时接待的飞行员，其中就有三两个红色高棉？他们可是手里沾血的“老外”啊。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有一点穷人生富嘴的后现代幽默。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总结，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

全中国当时的铁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个死胡同，火车开进去再倒出来，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车站，都是两边敞开，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只要有足够耐心，总能避开候车室的剪票口，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因此，进站这一关并不难。难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很不好办。到了这种时候，我通常是硬闯，硬着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作餐车回来路过状，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一点忙，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多半不盘问，有时露馅，则补票认罚，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没有教会我智慧。当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够。以智取胜者，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他有一次要从陇海线转北京，再转京哈线，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陲，看望他在那边插队的妹妹。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仅够买馒头填肚皮。他的绝招是：穿上一件军大衣，领子扣好，底下一条绿军裤，遇有险情发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标准的官话一路说过去：“让一让，让一让”，那查票者见他的装束，只以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部队干部去打开水，怎么会想到军大衣里面没有军装，更没有红色领章？当然是必恭必敬地“让一让”。五块钱行万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真是万恶之极！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评界著名理论家了，笔下文章多半是后现代符码，边缘写作、私人话语之类，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内，只能是瞠目其后，读天书一般。

河南实在太穷了，逃票人越来越多。铁路上也无奈，有时就派人戴着红袖章在车下堵，抓住后集体罚苦工处理。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时的混车陋习延续了几年。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60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星期天晚上从市区分散向车站聚拢回来，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同样也成一伙。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始搜索。逃票者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逐渐移动脚步往

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那个是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火车车门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截一段9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具往里一挤，就能夹成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就这么简单。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像还带回了上海？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以后，当了一段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淡忘在那个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那一年是我发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

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三百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语：汴京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那车厢里空气恶浊，每一口都是别人呼吸过的，熏得人头昏脑涨，一下车，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状态。那一天，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下后，头朝外，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神智已经不太清醒。车开不久，突听一句开封口音：“老哥，看看丢啥不丢？”不看犹罢，一看大惊失色：我那时穿的是蓝色的卡中山装，上衣口袋已经解开；口袋里放着一个信封，已拆开；里面的准考证露出半截，显然是被人看过，再插了进去，居然扔在了我的膝盖上！我抬头看去，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再上公共汽车的，此时围着我，也穿着那种军大衣，大衣撑开，以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丢啥不丢”。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这是“贼”，在火车上就锚上了我，到汽车上才得手；得手后发现是一张准考证，本可以下车一揉一扔，却不忍心坏了书生前程，而是掷还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贼”，还要提醒这个失主看看，要当场“验明正身”！这一幕太有戏剧性了，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得手后又怎样交换眼色，在无言中达成默契，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幸亏我那时年青，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明白，但毕竟不象现在这样容易失言，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声“抓贼啊”，那可真是杀了风景，为知识分子丢尽人了。我终于憋住那一声喊，而是抬头抱以同样微笑：“没丢，啥都不缺！”双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颇有古风的现代小品。演出结束，窃贼体面下场，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响指，三人鱼贯下车，军大衣一飘，一会就没了踪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飘逸！

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也是偏爱火车，不爱坐长途“灰狗”。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只是因为火车一动，能拉动往昔记忆。Amtrack当然好，乘客少，座位大，而且柔软，盥洗室宽大齐全，就象从飞机上搬下来的一样，香水、手纸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都有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们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样好看。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

的记忆，而且挥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聚拢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我自然想念开封车站上来的那个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我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名字。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二十年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扑通一声，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志，也是一个纪念。它们总在提醒我：

——别装蒜啦，老伙计，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先写你的中国底细吧；国家是白的，另一块自然是黑的，而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写你那五花大绑，写你那非法制作的小钥匙，写你那打开信封、又掷还失主的开封“贼”！

可怜我料定它们即使能发声，也只能是一口中原土音。

□ 1999年6月28日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

• 王 毅 •

“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的产生和它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文革政治体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进行文革的最主要工具和文革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核心（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和战斗指挥部”），而且更在于“中央文革”的成员构成、生存方式和运行方式都是非常怪诞、不易理解的：寥寥几个舞文弄墨的秘书文士（其中多数人的资历名望原来极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口悬天宪、执掌全国各级官员和亿万民众生死的权力巨头；这个极小的秘书班子取代了缜密有序的国家常规领导阶层，进而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和各种殊死政治斗争的策源地，并且在疯狂打击各种政敌的同时，又在新一轮接一轮永无止息的权力角逐中，难以自拔地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深渊。周恩来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执行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那么，文革中为甚么一定要发明这种“新生力量”以“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中央文革”上述诸多文化特质又是如何产生的？它们与中国政治制度史演进的长链又有怎样的关系？

### ◇ “中央文革”产生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

“中央文革”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是亿万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所十分熟悉的，这里仅作简要的回顾：1964年5、6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1966年2月3日，小组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了长

时间的讨论，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拟向中央汇报。先此，彭真和康生已于5日将《提纲》的内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大家表示同意。8日，彭、康等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面并未表示异议（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追述：“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12日，彭、康等到上海，将《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均表示同意。23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不久以后，《提纲》即被毛泽东指斥为“修正主义纲领”

与上述党内正式渠道的运作相对，毛泽东早在1965年就私下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用极隐秘的方式将文章初稿传送到北京反覆修改。1966年3月下旬，康生藉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的文章为甚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这话当然触怒了文章的幕后组织者毛泽东，所以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于是毛说：“再不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月底，康生回到北京，向钓鱼台写作班子传达毛发动文革的精神，并要王力起草《通知》，宣布《提纲》作废。《通知》初稿被毛泽东认为过于简单，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另写一批判《提纲》的文件。陈遂与王力共同起草，然后送毛泽东审定。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4月16日至26日，在杭州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毛泽东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此期间，毛对《五一六通知》反覆修改后下达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被迫接受《通知》，并作为“中发（66）267号文件”下达，“文化大革命”遂由此而发动。5月28日，“中央文革”亦在原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名单主要由江青提出：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8月，陶铸被任命为顾问。在文革初期，1966年5月至12月，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参加。但是在1967年1月，江、陈、康等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书记处遂停止活动。接著，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以后，中共八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对“中央文革”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确认：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报》紧接著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文革的这一破一立，当然具有联袂并举的最显著联系。直到中共九大开会时，“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主席台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右边，主席团名单亦是“中央文革”成员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员排列在后。

#### ◇ “中央文革”的政治禀赋、功能及其文化意蕴

导致“中央文革”产生方式及其成员构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毛泽东感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常规权力体制在贯彻和强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的个人意志又经常受到这套权力体制的强烈抑制；另一方面，亦在于他对国家体制日益官僚化和“变成法西斯党”危险的警惕。所以早在文革以前，他就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多次说北京的空气不好，说自己不读《人民日报》；他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暗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

平主持的书记处；文革前他长时间远离北京，甚至“重上井冈山”，酝酿“以农村包围城市”；他不断对教育和文艺体制予以强烈的抨击……。因此，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这种对国家政治路线性质的基本判断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敌视（从早年的喜爱绿林小说到晚年对“宋江投降”的批判，他一生始终伴随著对国家体制的强烈“造反情结”，这对判断国家制度的性质和发动文革有重大影响。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周期性“造反”机制与文革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述），所以后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首要目的就在于“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为了摧毁常规权力体制，毛泽东必须在国家制度中造就一个与此目的相适应、得力而强大的政治工具，这个工具要具备的条件是：1.它必须由毛泽东直接和完全驾御、绝对按照毛的个人意志行事，即前引周恩来所说，“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2.它必须具有极强的政治能量和权力欲望，以便与常规体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3.从政治禀赋来说，它必须与一系列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矛盾、甚至相敌对；与此相应，从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它也必须舍弃常规方式而以阴谋诡计等一切非常规方式为基本手段；4.它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的鼓动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在舆论上具有充份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文革”的一切政治恶行，主要都不是由于其成员的道德恶劣以及他们与无数受害者的个人恩怨所决定的；相反，它是出于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根本性需要。

毛泽东通过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与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并非偶然，早在他热衷的合作化运动中，由于负责农业的一些领导人被认为是拖运动后腿的“小脚女人”，所以他在〈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中对之提出严厉的批评。“而这篇讲话是在他无视某些地位极高的同事们的看法以及党的农村工作部的计划的情况下发表的。它越过中央官员，直接向省级领导人发出呼吁，……为了保证省级领导人不受中央农村工作部观念保守官员的限制，他在1955年夏天将两名久经考验的助手安插到该部担任副部长。这两个人是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和陈正人。”可见，毛泽东对这种政治操作方式的运用久已娴熟有效。为了保证这种有效性，毛泽东对秘书班子的基本要求即在于：他们绝对不能被国家和党的常规权力体制所控制。据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何载追述，他在50年代调入中南海时，在杨尚昆领导下就任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和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1956年的某日，毛泽东的身体不适，“不久我得到了电话通知，要适当减少给他送阅的东西。我……向有关办公室转达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当年的习惯是每天要看三四万字的东西，现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发觉，在一个会议上提出批评，说一个姓何的封锁他，还举了些历史上封锁国君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的史例。我简直吓坏了，认为闯了大祸”。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睡在身边的”敌人运用国家常规权力体制以达致“封锁国君”的目的是有著高度警觉的。同时，联系古史，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1956年直至“中央文革”的操作方式难道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吗？而对此疑问的说明将让我们看到：文革与中国古代君权专制制度的联系，并非只是局限于人们通常直观看到的表层（例如家长制），相反，在政治运作方式等等层面，两者的相通实具有更深刻的、更具制度化的意义。

#### ◇ 从皇权与官僚体制关系的历史看“中央文革”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传统的君权政体中，皇权与中国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矛盾、乃至相互激烈冲突的一面。后一方面的情况即如明太祖朱元璋所总结的：“自秦汉以来，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争月夺。”因此，在这种长期的矛盾关系中维系君权的至高无上，就成了秦汉以后中国国家权力体系发展演化的一条重要线索。而这种演化的基本轨迹在于：如何在必须建立庞大国家常规官制制度并赋予它巨大权力的同时，又能克服它对君权的束缚、保证君主的集权。

秦汉以后庞大统一君权国家的建立，要求相应地建立庞大的官制体系。早如战国后期的政治家就说：“君者何也？曰能□也。……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臣守职，百官有常”。这是指以宰相为首、序列百官的正规国家官制体系，它的建立、完善和有效运作，是国家政治有序化的基本保证。但另一方面，庞大完整的常规官制体系之建立和有效运作，又必然与君权独专的趋向发生矛盾。例如，宰相百官可以通过谏诤、对诏书的核议、一层层的政务程序等制度化的合法手段来抑制君主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当然又要引起君权的反抑制。从根本上说，君权的反抑制不能完全依靠君主的无法无天、滥施淫威等非制度化手段来实现，因为这不仅效力有限，而且不具备长久的权力合法性（韦伯 Max Weber 指出：权力体制的合法性一般是综合运用特殊威信、法定合理的合法性和传统合法性的结果）。所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必须发明一些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君权独专得以充份实现的手段。这些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不断在常规官制体系之外，设立被皇帝个人亲幸的政治班底，由它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高机密，并且通过它对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抑制；同时，努力赋予皇帝的这个私人班子以合法性，使之在常规体制中得以立足甚至膨胀。

上述规律在汉代以后的官制演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汉代常规官制体系原本主要是由以宰相（三公）为首的外朝百官组成，皇帝身边的各种人员只负责生活服务而不具备政治权力。但是汉武帝感到这种制度不能适应君权充份控御的朝政的需要，于是为了强化皇权并抑制宰相公卿的权力，他就在常规官制之中强行楔入“加官”制度——即皇帝超越正常的选拔程序和宫禁制度，亲自擢拔一些富于才干的官吏（多数出身较低微）成为“出入禁门”的“腹心之臣”，并让他们越过外朝百官的制约而直接向自己提供消息、协助制订政治方案。汉武帝的另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是：任用原本地位很低、负责掌管宫廷文书的小吏“尚书”，充当自己身边掌握国家政治机密的谋臣。以后，这种政治设计迅速制度化：在汉代，尚书（与三公相比，他们通常是皇帝的亲信而出身低微）的地位不仅越来越高，而且极大地侵夺了宰相和御史等外朝高层首长的权力。东汉时，“尚书台”实际上已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而原来总揽朝政的宰相则日益被架空，所以史籍记载：“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台）”。至魏晋时，尚书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的国家宰相，而三公则成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虚衔：“中书、尚书之官始为真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这一演化过程说明了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专权远不仅仅是皇帝的强烈个人意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必然固化为一整套可操作的程序和具体有效的制度。

历史的发展多次重复著上述规律。例如当尚书在魏晋完全取代三公而成为外朝百官首长时，皇帝已经不允许其身兼内朝和外朝的权力。具体方法是剥夺了原属尚书郎（尚书的属官）起草诏书的权力，改由以前仅为宫廷小臣的“中书”负责，而尚书仅负责诏书的执行。由于中书是侍奉皇帝左右、负责宣达圣命的文士，所以其部门首长（中书令）也就很快同尚书令一样，于名于实都成为政府首脑。而当这一制度确立以后，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们又启用出身微寒、富于政治进击性的文人学士作为自己半秘密和负责起草诏书的政治秘书班底，并给予惊人的巨大权力，以与制度化的庞大官制体系相抗衡而保证皇帝专权的充份实现。这种中国历朝延续不断的政治秘书班子，在南北朝时是“中书舍人”，在唐代是“北门学士”、“翰林学士”，在五代是“枢密院”，在清代是康熙时的“南书房”和后来的“军机处”。

擢拔地位低下的文词之士以为“天子私人”并组建“学士院”，进而任用这些恩幸权臣作为“专掌内命”、控御朝政的工具，这种制度相当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体系“封锁国君”的可能，但是它并不能杜绝专制体系中的其他“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例如南朝时，皇帝出于戒备宰辅等外朝众官的目的而让国家行政大权掌握在侍奉于自己身边的几个恩幸文士小臣（中书舍人）手里，结果是：“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

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断。”也就是说，恩幸文士的“鼠凭社贵”极大地激化了权力体系中一切固有的矛盾冲突，并导致整个国家迅速沦入灾难的深渊。然而，由于离开了这种手段，君权就无法抑制常规国家官僚体制“封锁国君”的趋向，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国君”们就只能重演著这几乎千年未变的悲剧。只要略略翻阅一下历代史籍中的有关传记，就可以立即知道本文上节列述“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禀赋和行为方式，其实无一不是历史上这些恩幸文臣及其政治组织世代沿袭不改的。限于篇幅，仅举北魏中书舍人温子升的例子。当时，魏庄帝已经秘密布置好诛杀执掌朝政的大将军尔朱荣的计划，并由近侍文人温子升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当温子升拿著诛尔朱荣的诏书出宫时，迎面遇到尔朱荣入宫。尔朱荣拿过诏书问道：“里面是甚么内容？”温子升应答时神色不变，丝毫未引起尔朱荣的怀疑，所以他并未打开诏书细看，遂毫无戒备地入宫受死。古代这类例子，当然与1965年通过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并以此发动宣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刑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操作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指出：“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在中国君权的长期发展中，其“自动保持自己”的趋向演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式和缜密的制度，所以它能够积淀成为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资源和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而长久地影响著后人。因此，透过“破旧立新”、“新生力量”等等外衣而见出“中央文革”在本质上向中国传统政治操作方式“返祖”的路径，也就是清理文革文化基因的具体工作之一。

□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第五十期

∞ ∞ ∞ ∞ ∞ ∞ ∞ ∞ ∞ ∞ ∞

### “书生”及“梁效”评议

• 沙叶新 •

《毕竟是书生》一书是作为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的周一良先生撰写的自传和回忆录。书名源自一句挽联。1980年，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逝世，有人挽曰：“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周一良先生在自传中说：“‘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深深触动了我。……因而用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现用这五个字来概括自传中‘文化大革命’一节。实际上，也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

魏建功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吸收加入“梁效”（“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因注释梁效《孔丘其人》的引文“趋进，翼如也”，有影射周恩来之嫌，为清议所不容。死后，朋友的挽联上说魏建功先生“毕竟是书生”，多少有些为他开脱，对他表示谅解；况且这是别人对他的宽恕，并非魏建功本人的夫子自道。周一良先生也同在“梁效”效劳过，同样为清议所不容，不过周一良先生尚健在，并自称其“健康状况……还算是被人艳羡的”，未盖棺便论定，便自我评价“毕竟是书生”，这显然有些匆忙。

我一向认为历史学家最具洞察力，最能知人论世。但历史学家对自己的历史是否也能洞若观火，是否也能有知己之明呢？宋人吕祖谦说：“明于观人，暗于观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见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见其睫；举千斤之重者，不能自举其身。甚矣，己之难观也。”周一良先生如何呢？他对自己“毕竟是书生”的论定是否也属“己之难观也”呢？

所谓书生，中性的解释是“学者”，是“读书人”。周一良先生出生于宦书香之家，受业于名宿巨儒之门，进过私塾，读过哈佛，先后在清华、北大任教，是

名校的名教授。从出身、经历、学养、师承来看，周绝对是“学者”，是“读书人”，是典型的“书生”。但这类“书生”大都有个共同的征候，即但求学问，不问政治。正如周一良先生在自传中所坦言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我都置身于事外。”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即便在“政治挂帅”的解放之后，也有一些“书生”如被周一良称之为“我所最敬仰的伟大学人、一代宗师”的陈寅恪先生也厌弃政治，他曾明确表示不信奉马列，不就任官职，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超然于党派之外，醉心于学问之中，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但是也曾是“书生”的周一良先生却在解放以后成色有变，与他所敬仰的陈寅恪先生异趣异途。

解放初期，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或被迫地洗心革面，洗脑索瘢，这便是在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过后，大部份知识分子也都自觉或被迫地转换了立场，更新了观点。周一良先生当是其中移宫换羽得甚是自觉的一个。他在自传中说：“经过学习、讨论、检查，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思想。这样想通之后，我坚决信奉不变，始终如一。实际上指导我以后几十年的行动：服从需要，不讲价钱，做驯服工具。”1956年周一良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擢升为北大历史系副主任。1957年反右，周一良先生说：“鸣放期间确没有什么不满，运动开展后则诚心实意努力紧跟，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如此。”期间他曾主持过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1961年，周一良先生“在自己所用的年表上留下几句‘书以自勉’的话，可见当时真心跟着党走，努力工作的心情”，其中有两句是：“一心向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百倍努力……（……惟有依靠群众，贯彻领导意图，龟勉从事）”“文化大革命”初期，周一良挨斗，当时他“想：自己一向兢兢业业，努力改造思想；从来循规蹈矩，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何罪之有？因而不肯低头。”后又想：“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和考验。”于是卷入派性斗争，当上了“井冈山”（当时北大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名称）的头头之一……

周一良先生如此能够“服从政治需要”、“贯彻领导意图”、甘当“驯服工具”，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努力紧跟”、“积极投身革命”，这样一个好赏员，好干部自称“书生”，未免过谦，评价过低了。

如果周一良先生坚称自己是“书生”，那“书生”的本行即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又如何呢？1961年他主编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该教材他自认为“采用一般接受的观点，虽然尚未彻底摆脱苏联教材窠臼，但较为适用。”不过尔尔。此外，周一良先生还写过两篇关于明治维新的论文。另有一篇“仅开了个头，‘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夭折了”。周一良先生不无感慨，他说：“中华书局为我出了一本《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都是解放以前的论文，我戏称它为《我的前半生》，解放以后，我写过一些中国与某国友好关系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多数不足以言研究也。”也许正是因为学术上已少书生本色，所以蒋天枢先生主编陈寅恪先生全集时，将陈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周一良先生的某一节删去。周一良先生说：“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删去此节，正是目我‘曲学阿世’，因而不愿存此痕迹。”

中国的书生亦即古之“士”，孔子说：“士志于道”。“道”即人生理想、社会责任。士的天职便是以自己所拥护的道统来批判礼崩乐坏的正统。士，重道义，轻王侯；说大人，则藐之；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不曲学阿世，不奉命而作，不惜以生命捍卫真理；正如邓拓诗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才是有“士气”的真名士，有“书香”的真书生。

西方的书生则被称为知识分子，是时代的代言人，是公众的眼睛，是社会的良

心。他们常常发表和权威相抵牾的议论，习惯将任何结论都当做问题。而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更具批判精神，正如一校长所言：“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它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因而西方知识分子也无法理解本应是最具有自由之思想、最具有独立之精神的像周一良先生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为何竟成了“服从政治需要的驯服工具”。

当然，“书生”还另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书呆子，是迂夫子，不通达事理，不顺应世故。周一良先生在叙述他在梁效的经历时，就特别地显得书生气十足；单纯得像孩子，天真得冒傻气。

周一良先生在梁效工作两年，他曾反对将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以免影射某领导人，他还建议将林彪读《资治通鉴》的《魏纪》和《隋纪》加以圈点的段落写成批判文章，“可惜未被采纳”。这是他所做的两件好事，在自传里当然值得一记。他也不讳言曾写过一篇《诸葛亮与法家路线》的文章，并承认该文“配合甚嚣尘上的儒法斗争，……客观上也构成‘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组成部份，而我自己还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出力。”但这样的自白无非要表明他的主观动机甚好，只是客观效果不佳。他甚至还天真地认为批林批孔使得自己“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了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并且“由研究法家著作而引起群众对古典文献的兴趣，这些倾向都与我的思想合拍，因而心安理得。”这就如有人拿刀杀人，周一良先生视而不见，感兴趣的只是那刀的锋利和制作精良。这真的是周一良先生的书生之见，还是以装傻表天真，以糊涂示单纯？对日后的审查，周一良先生也颇有怨言，并非如自己所说的“平静自若”，曾表示：“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谈不到经验教训。”

我相信周一良先生在梁效里并无大恶，更非“一个老朋友”谴责他的“无耻之尤”；我也同意他说的，不应“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被领导派往梁效，也确实不能完全由个人负责。如果我在当时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应命。但是周一良先生是个史学家，史学家不但应有史才、史学，还更应有史识、史德，因而史学家在回顾历史、在考察梁效这样一个“四人帮”重要的舆论工具时，最好能摆脱个人恩怨，立于历史高度，以秉笔直书之史德、以洞见症结之史识，给自己、给梁效有个科学的、理性的评估。同是北大教授的冯友兰先生也曾陷入梁效，他在《三松堂自序》一书中也有过反省，他说他那些批林批孔文章“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这和“曲学阿世”是同一个意思。能有这样的自谴，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很是言重了。可周一良先生对自己在梁效两年的历史只是以“毕竟是书生”来交代，就显得过于轻松，因而少有深刻的自省，多有委屈的自辩，甚至有些隐约的自得，比如他说：“后来《红旗》重新登载了我关于《封建论》的文章，我又当了党的十大代表。毛主席逝世，我列名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所以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作为梁效成员始终处于顺境。”这段话不知是夸耀还是忏悔，情态之暧昧令人不解。

如今重提梁效，并非追究个人责任。作为个人而言，他们之中的成员并非个个皆是丑类，其中有些人也确实是在上当受骗，俗话说“还是好同志”；有些人也确实才气横溢，只是当时聪明过头以致一时昏头罢了。如今重提梁效，实在是因为梁效这样一个不是帮闲而是帮凶的写作班子太值得研究了。它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自古未有的御用的“书生”群体。类似梁效这样的政治怪物，北京还有初澜，上海还有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等，可惜至今都无个案的剖析和群体的考究。其中的障碍之一是“文化大革命”史学者对此项研究的意义远远认识不足，尚未认识到深入研究梁效、石一歌等等“文化大革命”遗产，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知识分子精魂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二是有些当事者在落水后或者悲观厌世，皈依佛门，不愿重提红尘往事；或者忙于云游，著书讲学，无暇打开历史黑箱；或者讳莫如深，巧言掩饰，绝口否认个中干

系——这些都给史料的搜集整理及深入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我想只要是历史，任谁都掩盖不了的。

1999年1月20日

□ 原载《沙叶新谐趣美文》

∞ ∞ ∞ ∞ ∞ ∞ ∞ ∞ ∞ ∞ ∞

中国人崇拜和迷信过毛泽东吗？

——文革迷思辨析之一

• 刘松原 •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的现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肉麻及渗透程度，超越了中国历代帝王，超越了任何一种宗教，也超越了其近代同人希特勒、斯大林、裕仁和金日成。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颂辞，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的效忠誓词；从《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语录歌曲等成千上万首颂歌，到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之类的顶礼膜拜；从印制数十亿册“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到无所不在不计其数的毛泽东塑像、雕像、画像、纪念章；从报纸电台会议课堂无处不引用毛主席“最高指示”，到成千上万的人深更半夜敲锣打鼓上街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这里所列举的行为仅仅展示了当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迷信现象之一斑，远远无法再现其登峰造极无孔不入的程度。不是亲身经历者恐怕永远无法想象那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行为是如何狂热愚昧荒唐可笑。

文革后痛定思痛，中国人开始反省为什么文革期间会产生七、八亿中国人集体疯狂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迷信。答案五花八门，主要可归纳三类。一是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影响说，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说，三是当年红卫兵造反派年轻单纯幼稚说。

其实，这些都不是文革期间产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迷信的原因。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文革发生的温床，但不是导致产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迷信现象的直接原因。众所周知，以儒为表以法为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入世的理性的文明，没有排他性的宗教色彩，没有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偶像，因而没有个人崇拜和迷信的理论基础。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至尊的皇权，但中国人畏惧皇权是因为怕杀头，并非对帝王崇拜和迷信。说白了，中国人谁也不崇拜谁。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于是就革命，就造反，不断地改朝换代。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如果不是子虚乌有，至少也是微弱得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中共是个列宁主义政党，崇尚领袖权威，但领袖权威是乱世英雄们在权力斗争中打出来的，不是靠崇拜和迷信形成的。从三十年代毛泽东攫取中共实权开始搞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后，第三国际也好，苏共也好，对中共都没有多大影响，更何况六十年代中苏公开决裂后，中共自认老子天下第一，没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能够影响它。文革完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外来影响很小。

把红卫兵造反派当年推波助澜参与执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迷信推诿于年轻单纯幼稚上当受骗，实际上是美化当事人的动机。许多红卫兵造反派在回忆文革时有



意无意地把所犯的罪行和做过的蠢事归咎为革命理想云云，试图开脱罪责或求得心灵上的安宁。这也是人之常情，无法苛责。但你要相信那些革命理想之类的鬼话，你才真正上当受骗了。笔者不敢断言因年轻单纯幼稚而大搞崇拜和迷信毛泽东活动的人一个也没有，但至少不是文革的主流。看一看当年红卫兵造反派如何残酷地羞辱折磨人，如何为主任、常委、司令之类的职位争斗得死去活来，就知道根本不是单纯幼稚的人做得出来的。文革的原动力和任何政治斗争的原动力没有什么两样：权力及其背后的名利。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革期间出现对毛泽东崇拜和迷信的原因？

答案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崇拜和迷信过毛泽东。

文革中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和迷信现象并非中国人真正崇拜和迷信毛泽东，而是毛泽东、林彪两个政治集团为宫廷政治斗争需要，由国家宣传机器倡导，以军队、警察和“群众专政”等暴力为后盾炮制出来的。

毛泽东、林彪为了夺取刘少奇掌握的权力，除了军事方面的动作之外，需要在声势舆论上压倒刘少奇，以抵消刘少奇在党政组织内的优势。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是先声夺人置敌手于四面楚歌中的伎俩。当时对毛泽东的颂辞颂歌及其他个人崇拜和迷信行为大都是自上而下，先由官方宣传工具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记录影片推出，然后由各地红卫兵造反派或仍在运作的党政组织效仿推广，具有明显强烈的官方色彩。

中国人对待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和迷信的态度呈正态分布，即常说的两头小中间大。强烈支持和强烈反对者都是少数，大部份人无所谓。强烈支持者籍此在政坛上蹿红或以此为武器夹嫌报复，强烈反对者或出自于良知或出自于对毛、林的憎恶。大部份人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感，但对自己的直接危害尚可忍受，于是就随大流。

文革期间如果谁胆敢反对或不满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和迷信，轻则遭“革命群众”肉体和精神惩罚，重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下牢或枪毙。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而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连一些无意的冒犯和童言童语都不能幸免。那时人人小心翼翼神经紧张，生怕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做错一件事触犯毛泽东，否则不仅自己遭殃，还会株连亲友。在如此红色恐怖下，中国人不得不屈从淫威，叫喊万岁就喊万岁，叫背语录就背语录，叫磕头下跪就磕头下跪。这就是所谓七、八亿中国人集体疯狂崇拜和迷信毛泽东的实质。

自一九六九年毛、林向刘少奇夺权成功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就开始降温。一九七一年林彪和毛泽东争权失利后去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进一步降温。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就几乎荡然无存。这一幕历史闹剧的轨迹也充份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没有真正崇拜和迷信过毛泽东，只是又一次屈从了血腥的皇权。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五）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八章 清华四 • 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造反派又在全国较为普遍地分裂成两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在河南，有“河南造总”和“二七公社”之分；在黑龙江，有“山上派”和“山下派”之分；在湖北，有“三新”和“三钢”之分……即便在中学红卫兵里，北京地区有“四四派”与“四三派”之分；上海地区也有“红代会”与“中串会”之分。如同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主要理论家在他那篇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东方红战团一战士）指出：“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的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又如他在同一文章中假定：“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以至他认为这种全国性分裂的两支造反派，可以方便地称呼为：“四一四派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1〕

当周泉纓在写作这一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纲领性的思潮文献时，他或许并没有想到一年后他会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评判。1968年7月28日凌晨，当毛泽东下决心把红卫兵赶下历史舞台，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所谓“五大领袖”时指出：“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毛泽东又说：“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鉴于当时周泉纓已在狱中，毛泽东下令放人：“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抓他干什么？”〔2〕至此，可以认为四·一四思潮已在全国范围内被毛泽东直接点名为一种“右”的异端思潮。但奇怪的是，此后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四·一四思潮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异端思潮象湖南“省无联”，武汉“北、决、扬”，甚至上海中学生的极左思潮“中串会”那样受到过正式的批判。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正面审视一下什么是清华四·一四的主要政治观点，以及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流行的社会思潮了。根据清华大学文革史的研究者所述：“1969年4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团派）和414总部（4派）。两派在一系列文革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3〕什么是他们的分裂导火线呢，据此研究者的分析，这“主要表现在文革中的策略、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清华的评价等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的就是干部政策。这些伴随着兵团成立，发展而来的分歧和矛盾最终使兵团于1967年4月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总部……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50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4派把团派这套理论称之为‘大翻个理论’，即从根本上否定1949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倒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4〕干部问题的评价，讲到底是一个制度的臧否。当清华四·一四认定“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时，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了四·一四思潮的三大理论支柱。

其一是“阶级关系不变论”。与所有极“左”派的异端思潮认定文化大革命已造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不同，四·一四的主要理论是“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四·一四思潮认为：“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具体到被认为是“黑线专政”的教育部门，他们仍认为：“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5〕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四·一四派中不少人甚至认为：“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

二。”【6】

其二是“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从“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出发，造十七年反的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自然成了反动阶级的代言人。按周泉缨们的理解，“造反”派并不等于“革命”。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始终有这样一个现象为人们所不理解：为什么反蒋（指原清华大学校长，“黑帮分子”蒋南翔）反工作组的时期，造反派里有不少人出身不好？每个人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种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人们发现没有一种站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能说明这一点。而所谓那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论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于是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四·一四们的结论是，他们（即造反派）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7】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十七年阶级路线的“血统论”分析法，又可以看到十七年中中共官僚阶层惯用的反右斗争式的政治形势估计。

从此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清华四·一四派在文革中要死死捍卫的是周恩来——旧官僚体制的代表。而在私下议论中，对刘邓为代表的十七年体制更是十分留恋的。

其三是“文化大革命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议论”。周泉缨在他那篇以〈和周泉缨谈话纪要〉命名的自白中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应当“收”了。周泉缨拐弯抹角地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人跑长了要昏倒，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的局面，因而必须“修整、巩固、妥协，”以防止“一个朝代垮台”，而使“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8】一句话，在他夫子自道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要求对十七年的干部政策，阶级路线以及整个政治秩序的留恋和要求重新恢复的渴望。

出于这样的一些理论基础，周泉缨们必然对1967年后群众运动的继续推进大为不满。清华团派所办的《井冈山报》在1967年6月22日重刊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周泉缨便借题发挥，于1967年9月14日贴出一张题名为：“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的大字报。此时，作为“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早已于一年前被打倒，周泉缨的矛头显然是另有所指的。9月17日，周泉缨又嫌矛头所指过于朦胧，又贴出一张题名为〈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的大字报。这里，“之流”明白无误地暗示他矛头所指的是陶铸以外的人，而“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则明确地点出了陈伯达是当代“袁世凯”。这两文的中心观点，都认为陈伯达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引向了歧途。他们以“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主要表现是“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周恩来——引者注）的常委大权。”此外，陈伯达还要“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对十七年的政治秩序“搞‘大翻个儿’”，“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搅乱阶级阵线。”去“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9】

既然周泉缨为代表的四·一四思潮认为陈伯达已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引向了歧途，那么说他们内心深处对文革其实取否定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那篇〈谈话纪要〉里，周泉缨公然把文革的成绩比作“秦始皇修长城”，并指责他“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自然有影射毛泽东之嫌。【10】在私下的议论中，周泉缨和他的伙伴们更是直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干

部大换班”；是“打倒‘刘家军’，换上了‘林家铺子’”的“排斥异己”的权力斗争。由此他们更直截了当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引起的原因，一则是‘个人需要’，二则是‘排除异己’”。〔11〕

清华四·一四思潮自然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求恢复十七年政治旧秩序的异端社会思潮，而问题在于，这一思潮的代表者既不是类似“联动”式的中共高干子女的组织，又不是保守派的红卫兵。而是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的一支，却一再批判造反派，似乎有点令人费解。其实，这正说明了文革中的所谓“造反派”，并不全部具有反体制的思想意识（不管是自觉或非自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意识在他们许多人的脑中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旧的政治秩序在他们不少人心中也仍是神圣的。只有造反派中一部分激进派思想家，才具有稍微自觉的反体制意识。

除此之外，四·一四思潮的产生恐怕还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造反派的迅速为权力的侵蚀与腐化，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此相当失望；第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在中央残酷的权力斗争越来越使青年人看清楚政治斗争的黑暗；第三，文革所引起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无序性与无规则性使人们甚至觉得还是文革前的旧秩序更为安定。无疑，四·一四代表了一种旧秩序的复辟思潮，而这一思潮的产生，却是以反复辟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直接后果。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毛泽东公开说他反对四·一四思潮，而四·一四思潮却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任何批判。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的态度，其实是矛盾与暧昧不清的。他当然反对四·一四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矛头指向他及其追随者的那部分观点。然而，在文革确实进入“收”的阶段，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始把红卫兵全部赶下历史舞台，与旧官僚阶层及其代表周恩来开始联盟的1968年下半年，他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从组织上，他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旧官僚阶层和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出身好的党团积极分子。从思想上，他开始反对“阶级关系变动论”，“特权阶层论”和“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论”等激进的造反派思潮，概而言之，他所实践的，正是四·一四思潮所主张的，因而怎么可能再认真地批判四·一四思潮呢。从这一观点来看，四·一四思潮真是一种强大的代表中共本质的旧秩序的思潮，当邓小平终于复辟成功时，可以说四·一四思潮是确确实实地一时胜利了。

注 释

〔1〕 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2〕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的谈话。

〔3〕 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

〔4〕 唐少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见本刊zk9607b——编者）

〔5〕 〈四一四思潮必胜〉，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6〕 〈历史的判决〉，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7〕 〈论造反派〉，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8〕 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9〕 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8年9月。

〔10〕 同注〔8〕。

〔11〕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八章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新民 (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曾 敏 (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 (美 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支持:	张雨田 (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 (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 (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 (美 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 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
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